

第二章

大學通識教育： 涵義的釐清與目標的展望

一、引言

在探討大學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際之前，我們必須先對所謂「通識教育」的涵義加以釐清，針對現存於若干人士心中的關於大學通識教育的質疑加以回應，並針對通識教育的目標，提出若干展望。但是在展開上述各項論述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最近十餘年來國內大學教育的困境加以分析，並在當前大學教育的具體脈絡中，提出通識教育的定義。

二、當前大學教育的困境及其對應策略

1987年7月戒嚴令廢除之後，台灣進入了歷史的變革期。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社會多元化的改革潮流中，大學教育的改革居於關鍵性之地位。大學是近代世界史上歷史變遷的聚合點，大學師生的政治抗議運動常常是政治民主化的催化劑；大學所培育的知識份子也常常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奠基者；在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大學也是「知識工業」的重要基地，因而也是引導未來歷史發展方向的一大重要力量。

現階段台灣地區各大學，正如世界其他國家的大學一樣，

面臨許多普遍性的問題，其犖犖大者如：如何在「國家化」與「國際化」之間、在教育機會平等與能力取向之間、在保存傳統與展望未來變遷之間、在大學教育功能的多元化與一元化之間、在個人利益之追求與整體社會規範之建構之間，維持應有之均衡，均是當前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大學共同面臨的挑戰。¹但是，台灣除了上述問題之外，尚有許多特殊於台灣的問題，有待我們加以深思。進入後戒嚴時期的台灣地區各大學，從過去數十年的威權體制中解放出來，邁向校園的自由化與自主化，努力於從千瘡百孔中重建大學的生機。但是，處於歷史的漩渦之中的國內各大學，未來到底是從佈滿荊棘的困境中，邁向充滿牛奶與蜂蜜的美麗樂土呢？或是因為嚮往天際的彩虹，而踏碎腳下的玫瑰呢？這是我們現階段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我們首先分析在近年大學教育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民主化的困境**」(predicament of democratization) 及其所產生的流弊，並探討流弊之所以形成的深層原因。我們接著分析第二種困境——「**資本主義的困境**」(predicament of capitalism)，指出它的形成以及可能潛藏的弊端，並分析弊端之所由來。我們再就針對這兩種我所謂的「困境」的所提出的質疑意見，加以剖析，並分析持論者的立論基礎之薄弱。經以上思辯之後，我們再針對以上兩種困境，指出因應策略在於重建大學知識社群內的自律性，並與大學以外的社群或部門建立相對自主性。

(一)民主化的困境：現象與分析

近年來台灣地區的大學教育所面臨的第一個困境是「民主

¹ 加州大學(柏克萊)前任校長及加大系統總校校長 Clark Kerr 最近對這些問題，曾作深入分析，極有見解，參看：Clark Kerr et. al.,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化的困境」。我在這一節的論述中所要提出的論點是：(1)所謂「民主化的困境」是指近年來各大學校園之學術是非取決於選票之多寡此一特異現象而言；(2)這項困境帶來至少兩項惡果：(a)大學行政體系之腐化與理想主義的墮落；(b)在強調形式與票數之下，實質的學術水準之不受重視；(3)形成此一困境之根本原因，乃是由於學術領域之運作邏輯(modus operandi)受到政治領域運作邏輯的宰制所致。我們依序析論這三個論點。

(1) 民主化困境的形成

1987年7月戒嚴令的廢除，標誌著戰後台灣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戒嚴令的廢除好像壓力鍋的蓋子一旦掀開一樣，四十多年來台灣所蘊蓄生氣蓬勃但無處宣洩的社會力、經濟力、乃至文化力，隨著戒嚴令的廢除，紛紛一擁而出，表現而為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原住民運動等等，並且企圖在政治領域中，將這些力量加以落實。近年來，國內各大學在這種歷史扉頁翻動的時刻裡，也快速地走向自我轉化的過程。一言以蔽之，近年來國內大學的自我轉化基本上是從過去數十年來的工具性角色逐漸轉化為自主性的角色。²換言之，自從光復以來，各大學在政策的主導下被賦予了過多的非教育功能，如促進經濟發展、加強國防建設、完成政治使命等，大學基本上是實踐國家意志與政策目標的工具。但是，最近十幾年來，在臺灣快速民主化的過程裡，大學的自主性與日俱增，大學從過去的千瘡百孔滿目瘡痍之中要求重新建構它新的生命，這是近年來促進大學校園民主化的結構性的動力。

²關於光復以來，大學教育之受到政治力滲透而發揮工具性功能的情況，從歷任教育部長與各大學校長的黨籍統計中，就可見一斑，參見：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編：《台灣高等教育白皮書》(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3)，頁79-84。

(2) 民主化困境的惡果

近年來，國內各大學快速地邁向民主化，雖然也有一些可喜的發展，例如：各項制度規章的建立，逐漸滌除過去校園政治的「人治」色彩；各項決策均講求「程序正義」，力求合法化，但卻也出現許多惡劣的後果，如「校園民主」的誤用，「政治邏輯」凌駕於「學術邏輯」之上等問題，對大學的生機傷害至深，將這種後果表現得最清楚的就是各大學的各級主管由普選方式產生這個新現象，³因此，我們就以大學校長的普選作為具體的個案，來觀察「民主化的困境」為大學生活所帶來的惡果，這種惡果主要有兩個方面：

(2:a) 大學行政體系的腐化與理想主義的墮落

國內許多大學實行學術行政主管由普選產生之制度，揆其原始用心，不謂不良善，因為在當時的客觀情境中，若干人士主張唯有透過普選，擴大學術主管的民意基礎，始能與政治權威如教育部等機構對抗。這種意見在當時特定的時空環境中，有相當的說服力。但是，一旦大學社群內的各級行政主管，皆全面透過普選方式產生，那麼學術的邏輯也就臣服於政治的邏輯之下而百病叢生了。舉目所見國內各大學內部的各種競選活動中，當前台灣社會與政治爭議性的議題，如統獨對抗、如省籍情結、如黨派對立、甚至如大學社群中的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衝突等，都隨著選舉而滲透到競選活動中，而成為校園中的熱門話題，並且在各項選舉活動中產生發酵的作用。由於選票的多寡是決定勝敗的唯一標準，因此，在選舉過程中派系的

³ 關於近年來國內各大學校長遴選的經過及其問題的初步探討，參考：陳舜芬：《大學校長遴選》（台北：師大書苑，1994）；黃俊傑編：《大學理念與校長遴選》（台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1997）。

合縱連橫、新聞界的介入炒作、競選對手的抹黑放話、乃至黑函的散布等等，一般台灣選舉文化中所習見的種種惡劣手段，都一一出現於大學校園的各種選舉活動之中。從這種選舉文化中高票當選的校園學術行政領導人士，一方面背負了極大的選舉包袱，使他們在校園內難以發揮行政領導的功能，而且在選舉過程及其後續餘波之中，校園的政治化、教授的派系化、職員的騎牆化等等發展，都成為近年來國內高等教育界的新現象，而這一切的問題都一再地說明了大學校園中理想主義精神的日趨沒落。在這樣的求學環境中，大學生則成為活生生的惡質校園文化的受害者，使學生的價值取向為之扭曲，流弊所及若干大學生把校務會議當作是立法院，一言不合，輕則拂袖而去，重則推翻桌椅，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2:b) 學術判準之受忽視

如上所述，所謂「民主化」以後的大學校園的一切決策是訴諸於選票的多寡而決定，而且，投票的「選民」是固定的成員，因此，大學社群內各級行政主管的角色，就從學術社群領導者的角色，轉化為大學社群利益的捍衛者的角色。由於各級行政主管皆面臨下次選舉中選票的考驗，因此，在諸多學術場合中，如教授升等與評審、課程之開授、研究所入學考試委員之聘請等等學術議題上，由於選票的考慮而難以一貫地堅持學術之判準，因此，在這種狀況下，學術的「質」的標準被選票的「量」所犧牲，因此，在民主形式的「理性」中，實潛藏著深刻的「非理性」質素，於是，所謂校園「民主化」就變成學術發展最大的障礙。

(3) 「民主化的困境」形成之原因

一言以蔽之，近年來國內大學的民主化之所以墮入困境，其根本之原因，乃是因為**學術領域的運作邏輯深深受到政治領**

域的運作邏輯主宰所導致。⁴在政治領域中，一切的事務都依循「多數決」而決定，政治領袖如總統、行政院長、省縣市長等等，都是不同程度的利益與權力的支配者與協調者，他們權力的來源在於人民的選票。獲得愈多的選票，就獲得愈多的權力。但是，大學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社群，誠如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所說：⁵

大學是個毫無顧忌追求一切真理的地方，所有的研究機會都要為真理服務，在大學裡追求真理的態度既是這麼徹底，一定會帶來最緊張氣氛，這是進步的條件。但是這種導致精神戰鬥的緊張氣氛是有意義的，因為它籠罩在一個共同的大前提之下，這個共同的大前提乃藉著各種極端表現出來。真正的研究者即使激烈爭論之中仍是團結的。

⁴ 這是教育部門所面對的普遍性的挑戰，從 19 世紀以降，英國、法國與美國的教育系統在形成過程中，都受到國家意志的影響。國家教育系統對於兒童的社會化、社會秩序的維持，乃至國家發展的推動，都發揮重要作用。參考：Andy Green,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近五十年來的台灣高等教育也面對同樣問題。關於戰後台灣經驗中，政府在教育部門扮演重要角色之事實，參考：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 1986), pp.112-3；葉啟政：〈高等教育和文化的關係：我國模式的探討〉及呂亞力：〈高等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我國模式的探討〉，皆收入：淡江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二十一世紀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體制、功能與學校組織》(台北：師大書苑，1990 年 4 月)；羊憶蓉：《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關於針對政治力之控制而提出的教育改革的建議，參考：朱敬一等：《教育鬆綁》(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⁵ Karl Jaspers, 杜意風譯：《雅斯培論教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 86。

在大學追求真理不負任何直接、實際的責任，他們只對真理本身負責任，研究者共同為真理而競爭，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生活的競爭。他們的競爭是在研究嘗試的層面，因此對個人的生活不發生危險，假如希望有大學的國家與社會能保護大學的話。

大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它的事務的運作是依照學術的原則而不是政治的原則。換言之，大學所關心的是學術判斷的是與非、對與錯，因為大學是堅持真理的殿堂，是批導社會引領時代的一個創造性的中心，也是社會革命的中心。但是，在近年來的台灣，若干人士一方面由於誤解了校園民主化的涵義，另一方面由於對過去戒嚴體制的反動，因此，近年來臺灣各大學在落實校園民主的過程裡，無形中忽略了政治領域與學術領域兩者之間的異質（heterogeneity），而且也忽略了政治領域與學術領域的運作邏輯兩者之間具有不可化約性（mutual irreducibility），因而無意中完全地援引政治領域中的「多數決」的運作邏輯，強加在學術領域之上，影響所及使作為學術領域中心的大學所特有的獨特性與自主性完全淪喪，這是造成民主化困境的重要根源。⁶

（二）資本主義的困境：問題與解釋

現階段大學教育改革中，所出現的第二個困境是「資本主義的困境」。在這一節中，我想討論以下三項論點：（1）所謂「資本主義的困境」，是指進入後戒嚴時期的台灣地區各大學，正逐漸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作邏輯的滲透與支配。（2）這項新

⁶ 其實，西方世界的許多大學，也深受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與虛假的「民主精神」所困擾，參看：John W. Chapman ed., *The Western University on Tra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25-78.

發展可能導致兩項問題：(a) 校長之為「學術社群領導人」之角色，逐漸被「大公司總經理」之角色所掩蓋乃至取代；(b) 大學教育商品化性格日益顯著，甚至發展成為教育之對立物。

(3) 造成此一困境及其衍生問題的基本原因，乃是因為資本主義之市場經濟，係以「最大獲利原則」作為運作邏輯，凡事講求落實「最大獲利原則」之「效率」，此與**教育領域以「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 作為基本原則**，實有其扞格難通之處。我們依序論證這三個論點。

(1) 近年來，國內大學教育所面對的第二個困境是「資本主義的困境」，所謂「資本主義的困境」特別是指隨著戒嚴令的廢除以後，社會日趨多元化，經濟更加國際化與自由化，在以上兩大潮流中，高等教育逐漸接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運作主導，尤其是「自由競爭」與「市場取向」這兩個原則，在國內高等教育中之影響力與日俱增。在 1987 年戒嚴令廢除以前，各大學在政治力宰制之下苟延殘喘，雖然各大學有規模大小之差別，有各種學術專業之互異，但是各大學都是「教育部大學某某分校」，為配合政治需要及經濟建設而辦學。⁷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運作邏輯逐漸進入我國高等教育界，各大學過去一元化的色彩逐漸減弱，而走向多元化競爭的時代。民國 84(1995) 年 1 月 23 日行政院院會所通過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金設置條例」，明白規定教育部在國立大學校院財務自籌比例達到百分之二十的時候，可以依照預算程序之規定，在各大學設置校務基金，賦予各國立大學校院適度的財務自主權。隨著這個

⁷ 參考：孫震：〈教育打破門戶之限〉，收入：天下編輯：《走過從前回到未來——攜手台灣四十年》(台北：天下雜誌社，1988)，頁 47；更詳細的論證，參考：Sun Che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Postwar Taiwan", in Stevan Harrell and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91-110.

新辦法的落實，國內大學之陷入「資本主義化」困境的趨勢會日益明顯。⁸

(2) 這種新的發展趨勢，相對於舊的一元化管制體制而言，不能說沒有它積極的意義。從這種發展的積極層面來看，各大學的自主性必將隨著校務基金的自主運作而日益加強，不必再像過去那樣地受到政府嚴格的會計制度掣肘而難以發揮各校的特色。而且，鼓勵民間依市場經濟原則自由興學，也是打破教育由官方壟斷的有效策略。最近致力於教育改革的人士，所提出的「鬆綁」理念，正是著眼於透過打破官方控制而解放教育。⁹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這種發展趨勢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其中較為彰明顯著的有以下兩點：

(2:a) 這種發展必然使得大學的領導階層，尤其是校長，開始面臨角色的轉換，也就是從理想中的校長之作爲學術社群的領導者身分，由於需要募款以維持大學營運的考慮，而必須汲汲營利，盡力開拓並增進政商關係，**於是大學校長的角色，乃逐漸轉化成為大公司總經理的角色**，這種轉化固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常態，¹⁰但是其所得可能不償其所失。其所得者可能是技術性的、表面的、營運的收支平衡；但是其所失的，可能是大學所賴以生存的最後的生命——理想主義的日薄崦嵫。

⁸ 我在本書附錄五：〈從當前臺灣高等教育脈絡論大學與產業界之關係〉，對這個問題有較詳細的分析。

⁹ 參考前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1994年8月21-22日，所舉辦的《鬆綁原則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的各篇論文，以及朱敬一等著，前引《教育鬆綁》一書。

¹⁰ 例如，二十世紀美國的大學結構與教育目標，也深深地受到大財團與政府的影響。參考：Clyde W. Barrow, *Universities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Corporate Liber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894-1928*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2:b)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操縱之下，第二種可能出現的問題就是**大學教育的商品化、工具化與世俗化**性格的顯著必然日甚一日，其流弊所及，可能使大學成為營利機構，或淪落為培育資本主義的新生力軍的補習班。大學不再是培養頂天立地有守有為的新時代知識分子的場所，大學在資本主義潮流的沖刷之下，其所表現的職業訓練所的性質，將有可能超過大學追求真理殿堂的性質，於是其結果就是使大學成為教育的目的一—敦品勵學成己成物——的對立物。

(3) 那麼，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探討，是什麼原因使得這種所謂「資本主義的困境」難以避免呢？市場經濟原則對大學教育來講之所以是一個可能的困境，原因甚多，而最根本原因則在於資本主義是以「最大獲利原則」為其基礎。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凡事講求獲利之效率，這項原則與教育領域之喚醒人的主體性，促進人的自覺，培育人的價值意識，協助人的自我實現等等原則，正好南轅北轍，水火不容。¹¹

舉例言之，為配合市場經濟的需求，大學的教育內容必然會發生變化，就業取向的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s）如商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等，將獲得較大的發展空間，企業經營、工商管理、資訊工程、電機工程等就業「市場」較大的學門，將大為發展。相對而言，基礎學門如：物理、數學、歷史、文學、哲學等，所分配到的資源，將大幅地被壓縮。這樣的一種市場導向的學術發展，必然導致大學教育的工具化，誠如雅斯培所說：¹²

¹¹ 這種矛盾正是最近 150 年來歐美資本主義文化中的基本矛盾，美國社會學家貝爾對這個問題曾加以分析，參看：Daniel Bell，趙一凡等譯：《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9）。

¹² Karl Jaspers，前引書，頁 64。

眾多大學存在的現象，造成了毀滅真正學術的趨勢，因為學術配合了大眾，而大眾只顧實際的目的、考試以及和這些事情有關的東西。研究工作則只限於那些可以有實際用途的，於是學術工作就限制於可了解、可學習的事物上，本來應該生存在無止境的求知慾浪潮中的大學，變成了普通的學校。

大學的理想主義在資本主義浪潮的衝擊之下，必然淪喪無遺，而成爲實質上的職業訓練所。

（三）兩種「困境」的合理化及其批駁

在上文的論述裡，我分析了現階段國內大學教育所面對的兩種不同類型的困境，各自代表政治力與經濟力對教育領域的擠壓與扭曲，造成大學教育的種種弊病。但是，可能有人對以上論述抱持異議，他們主張：（1）所謂「民主化的困境」是誇大其辭的指控，因為當前國內各大學需努力以赴的就是落實「校園民主」、「教授治校」之理念，而訴諸選票乃是達到校園民主並建立共識之重要手段，不足爲病；（2）所謂「資本主義之困境」，也是象牙塔中的「知識貴族」崖岸自高的誇大之詞。今日台灣必須促進大學與社會發展密切配合，從而使大學可以成爲社會經濟發展之礎石。針對這兩種合理化的理由，我想提出以下兩點理由加以批駁：（3）以上兩項辯解均缺乏前瞻性之眼光；（4）而且也忽略了大學社群與非大學社群（如政治、社會、經濟部門）之分際。我們接著依序闡釋這四個論點。

（1）針對本章第二節第一小節所謂校園「民主化的困境」，有人可能認爲這種講法未能切中當前台灣地區大學校園中的問題，因為校園民主是當前國家民主的礎石，只有透過教授治校，才是建立大學自主性的重要途徑，投票行爲固然不是達到校園民主的唯一手段，但是卻是重要的諸多手段之一。透過普選，

才能凝塑大學社區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因此，大學校園中各種事務訴諸選舉，並無本質上錯誤，選舉的流弊乃是由於技術上的問題，更何況在整個國家民主化的巨大工程中，總統作為國家最高元首都必須透過直選產生，何以大學的各級行政主管，不能夠訴諸直選呢？從這種角度來看問題，近年來為國內校園「民主化」提出辯解的人士，也可能舉若干日本大學校長透過全體教授票選的事實，來強化他們的論點。他們認為普選這個方式，不是造成問題的癥結所在，關鍵是選民的素質，因此應該接受指責的是大學中的教授——選民，而不是普選這個制度本身。

(2) 針對本章第二節第二小節所謂「資本主義的困境」，有些人士也可能提出以下的辯解：在一個快速邁向多元化的台灣社會中，大學不再是少數知識貴族所獨占而高不可攀的殿堂，大學應該從神聖(sacred)走向世俗(secular)，而與台灣社會的人民密切合作，共同創造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局面。因此，大學校園的開放，乃是奠定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多元化的基礎，我們不應把大學向社會募款，大學配合經濟發展市場的需要，當作是大學的困境。

更具體言之，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新世界形勢的前夕，台灣地區的各大學都不能自外於社會經濟的變遷，在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前夕，台灣所面臨的各種國內外經濟壓力甚大，舉例言之，為了進一步配合國家產業技術的升級，亞太營運中心的籌建，因應加入關貿總協後農業及服務業所需的人力，因應高齡社會來臨後所需要的成人進修教育，以及第二專長之補充訓練的需求，大學應廣開知識的窄門，而與社會共其呼吸，共同創造二十一世紀台灣的新局面，所以大學與社會的密切配合，是一種轉機，不是困境。直言之，大學本來就是職業的訓

練營，也是對社會提供服務的工作站。¹³

(3) 以上這兩種針對大學民主化與資本主義化的辯駁理由，分別觀之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其可以成立之一定的理據。但是，如果我們再更進一層加以分析，我們就會發現以上這兩種辯駁理由都有其思考上的盲點：首先，這兩種辯駁都是站在回顧過去的立場而提出的。舉例言之，強調校園民主的人士，主張廣植校園行政主管的民意基礎，以便對抗威權體制。這種主張基本上是針對解嚴以前台灣的舊體制而提出的。主張大學與社會密切結合的人士，也是著眼於過去大學只是國家（state）主宰下，成為落實政策目標的工具這項事實，基本上是一種站在回顧性的觀點來看問題。自從戒嚴令廢除以後，台灣快速的邁向民主化，威權體制已漸為民主體制所取代，而「國家」在高等教育的角色，也逐漸為「資本」所取代。這兩種回顧性的觀點，如果是針對戒嚴法廢除以前台灣高等教育的種種問題而言，有其一定的正確性。但是，如果從前瞻性的觀點來看，值得我們擔心的是在威權體制崩潰，國家以及政黨力量退出大學校園以後，所留下來的廣大空間，很容易被「資本主義」這隻大巨靈，以及惡質的選舉文化所滲透污染乃至顛覆。這才是我們應該嚴肅思考的問題。

(4) 更重要的是，以上這兩種講法，都同樣地忽略了大學社群與非大學社群（如：政治、經濟、社會部門）之間應有的分際。第一種辯論的理由，把知識社群等同於政治社群，因而主張總統直選的新發展可以導致大學各級主管直選的結論；第二種說法，則把大學之作為知識社群等同於現代社會中的各種社群，而把大學當作是社會政治經濟部門發展的工具。這種思

¹³ 關於這二點的分析，參考：Robert Paul Wolf, *The Ideal of the Univers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p.9-42.

考上的盲點，在戰後台灣在傳統／現代、本土／國際以及中國文化／西方文化諸多衝突的脈絡中，¹⁴更容易帶來複雜的後果。

以上這種思考上的盲點，使持論者未能從前瞻性的角度來看問題。未來台灣將是一個多元化色彩日益顯著，社會更加開放化，經濟更加自由化的地區。在這種社會經濟結構中，每個領域如教育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等等，都必須建立其相對自主性，而不能單向地要求大學完全配合社會或者經濟部門的需要而服務。

（四）脫困而出的策略：回歸教育本位重新出發

在上節的討論裡，我批駁了針對兩種困境所提出的合理化的理由，再度突顯當前國內大學教育的問題之所在。現在，我們依序論證脫困而出的策略如下：（1）面對解嚴以後新型的政治力與經濟力滲透教育領域之挑戰，只有**回歸教育原點重新出發**，才能邁向教育的康莊大道。（2）就大學內部而言，當務之急乃是建立大學社群內部的**自律性**，依教育及學術之邏輯運作。（3）就大學社群與其他部門（如教育部、經濟部、國防部）之互動而言，必須建立相對的**自主性**。我們就依序析論這三項策略性的看法。

（1）**回歸教育本位重新出發**：進入後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經濟、教育各個領域，仿佛從嚴冬之中甦醒過來，充滿盎然的生機。各個部門或領域的蓬勃發展，都共同說明了台灣已進入了「多元主體並立」的新時代。但是，在相互激烈競爭的

¹⁴ 參考拙作：Steva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Introduction: Change and Contention in Taiwan's Cultural Scene" in Stevan Harrell and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1-18.

諸多部門之間，教育部門是相對的弱勢團體，面對解嚴後的新形勢，承受了來自政治力與經濟力的強力干擾，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之下，我們思考任何教育問題，必須回歸教育的原點，才能重新出發，掌握正確方向。

所謂「回歸教育的原點」，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思考：首先，從消極面來講，所謂回歸教育的原點，是指相對於過去數十年來，教育部門成爲達到非教育目標的工具，而且教育部門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資源的分配都飽遭受非教育部門強力干擾的狀況，我們應該重新建構教育部門「自我立法」(self-legislature)的能力，也就是說教育部門是爲教育而存在，而不是爲教育以外部門而存在，這也就是我過去所提倡的「教育自由化」¹⁵的新政策方向的具體涵義。其次，就積極面而言，我們必須深刻體認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喚醒受教育者的主體性，促成受教育者的「人之自覺」，使受教育者覺醒並瞭解，人之存在並不是爲人之外的客體世界（如經濟發展、國防建設、政治民主等等）；人首先必須成其爲人，然後才能談到人以外的客體世界的建設與改善。更進一步言之，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平衡的人」而不是「一度空間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教育是在培育一個整全的人格，而不是開發人的某一特定部分的能力或傾向，而將人化約爲一個工具，西方馬克斯主義思想家對這個問題頗有深刻的反省，¹⁶中國古代儒家的教育理想在這一方面也宣示甚多，

¹⁵ 黃俊傑：《戰後台灣的教育與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自序〉。

¹⁶ 西方馬克斯主義者多認爲階級一旦形成，統治階級一定會運用一切可能資源（當然包括教育）去強化分工制，從而強化階級差距。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分流教育的第一個馬克斯學者可能是義大利的葛蘭西（Anornio Gramsci, 1891-1937）。他在 1910 年代的著作，以及在 1929 年到 1935 年於法西斯政府的監獄中完成的《獄中札記》中有許多篇章探討教育問題，批評當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教育政策。葛蘭西認爲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超越階級差別。他因此批判當時的教育體制分爲職業學校（vocational school）和古典學校（classical

孔子所講的「君子不器」，也就是扣緊教育的目的乃是培育完整的人而說的。我在本書第三章對於傳統中國的教育理念，將有進一步的分析。

(2) 在以上所說的整體性的因應策略之下，就現階段國內各大學內部而言，自從新《大學法》完成立法付諸實施之後，在新《大學法》的規範之下，各大學紛紛制定各校組織規程，這是國內各大學重新調整的開端。目前的當務之急在於：透過各大學組織規程的制定，以及各種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來建立**大學內部的自律性**。我所謂建立「大學內部的自律性」，是指讓學術的回歸學術，讓教育的回歸教育這個原則而言。換言之，大學社群內部事務的運作與發展，不是服從於「多數決」的政治領域的權力分配原則，也不是服從於「最大獲利原則」及「效率原則」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作原則，而是嚴格堅守學術的對與錯，或教育的是與非，必須堅持這種學術與教育的基本原則，大學社群的自律性才能建立，而免除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對教育邏輯的干擾與顛覆。

(3) 再就大學社群與大學以外的部門的互動關係著眼，大

school)。因為這種二分便是基於強化著階級差別：職業學校是為了造就新一代的工人和技師而設，古典學校則是為了培養新一代的統治階級和知識份子。職業學校的學生注定要被統治，而古典學校的學生注定要去統治別人。這種二分法不是一種民主教育，真正的民主不是表現在把無技術工人變成有技術的工人，而是意味著每一個公民都有成為執政者的可能，而社會以及教育系統也提供每個公民同等的有利條件以便達到執政的目標。為了達到民主教育的目標，葛蘭西認為應該為所有人民廣設「普通學校」(common schools)，這種學校也可稱為「人文化成的學校」(school of humanistic formation or general culture)。參考：黃俊傑、吳展良、陳昭瑛：《分流教育的改革：理論、實務與對策》(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第二章，〈分流教育改革的理論基礎〉，頁 10-11。

學社群與其他部門（如教育部、國防部、經濟部等等單位），應該保持南宋大儒朱熹（晦庵，1130-1200）所說的「不離不雜」的關係。所謂「不離」，是指大學並非象牙塔，無法脫離大學所存在的具體社會經濟情境而獨立運作。¹⁷因此，大學與大學以外各種部門，必須保持有創意的互動關係，但是這並不是說，大學必須臣服於大學以外的其他部門，而完全為教育以外的目標提供服務，從而喪失大學的自主性。我們必須在封閉性與喪失主體性這兩個極端之間，取得動態的平衡關係。換言之，大學與大學以外的部門之間，應該建立相對的自主性，這是我們從後戒嚴時期的台灣新形勢中，大學所面對的諸般挑戰裡脫困而出的重要策略。

（五）結語

我們這一節中，分析 1987 年戒嚴令廢除以後國內大學教育所呈現的兩種問題：（1）民主化的困境；（2）資本主義的困境，並建議脫困而出的策略在於回歸教育的原點，重建教育部門的自主性，並與非教育部門取得相對的互為主體性，維持創造性的動態平衡關係。換言之，大學教育作為台灣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既不能過於膨脹教育部門的主體性，以至於無法與其他部門互動；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喪失教育部門的主體性以至於淪為其他部門的工具。如何執兩用中，得其平衡，對大學教育工作者確是一大挑戰。

我們對當前大學教育所面臨的兩個問題的分析顯示：以「多

¹⁷ Flexner 早在 1930 年代就提出這項論點，參考：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3-4.；並參考：黃俊傑：〈從當前臺灣高等教育脈絡論大學與產業界之關係〉，收入本書附錄五。

數決」作為原則的「民主化」與以「最大獲利原則」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化」之所以會構成為大學教育的困境，乃是因為這兩項新發展，都忽略了學術教育領域與政治經濟領域本質上的根本差別在於：前者以「人之自我實現」為其目標，後者則以「群眾參與」及「市場導向」為其目標，因而要求前者服從後者的運作邏輯，困境乃於焉形成。

在我們分析大學教育的困境及其對應策略的過程中，處處顯示：**大學的本質在於對真理的探索，大學的生命則在於理想主義的堅持**。光復以來，臺灣的大學在威權體制之下，飽受政治力的凌虐而為特定意識形態服務。但是解嚴以後，庸俗化的政治文化卻又從根腐化大學校園中剛剛萌芽中的生機。而且，資本主義的大巨靈也虎視眈眈地企圖攫取大學教育的靈魂。在這樣旋轉乾坤的歷史性時刻裡，大學師生必須高舉理想主義的大纛，回歸教育之「促進人的主體性之覺醒」的原點，重新出發，才能為大學注入源頭活水，賦予大學以新生命與新氣象。

三、作為教育改革策略的大學通識教育：

背景與涵義

我們在上一節的論述中，分析後戒嚴時期台灣地區的大學教育的困境，並提出「回歸教育本位」作為解決問題的有效策略。在以上所說的重建教育部門主體性的脈絡中，我們就可以釐清大學通識教育的涵義。關於通識教育的涵義，我們必須放在大學角色的調整這個大脈絡中加以思考。我在這一個小節的論述中，想提出的論點是：(1) 在戰後 50 多年來的台灣，由於教育部門自主性的淪喪，所以各大學基本上只是實踐國家意志的工具；(2) 大學之作為國家意志的工具，在專業教育的強調

以及共同必修課程上表現無遺；(3) 隨著近年來台灣快速的民主化，大學的角色必須從過去作為國家意志的工具，轉化為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大學教育的改革乃成為台灣邁入二十一世紀前夕最重要的工作；(4) 在整體教育改革的工作中，通識教育是極其根本而特具關鍵性的一個環節，因為通識教育是重建受教育者的主體性的教育，通識教育以完成「全人教育」為目標。我們依序析論上述四個環環相扣的論點。

(一) 大學角色的改變：從工具性到自主性

(1) 在戰後「台灣經驗」的構築過程中，教育部門之量的擴張是一項重要因素。全台灣文盲的比例由 1952 年的 42.1% 到了 1994 年降低為 5.8%；在台灣的總人口中接受中等教育者的比例，亦由 1952 年的 8.8% 提昇至 1994 年的 52.6%。¹⁸自 1968 年到 1969 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國義務教育以來，教育的普及更是加速發展。另外，學校數目的增加，也加速了教育的普及化。在 1950 至 1951 學年度，全省各級學校總數為 1504 所學校，到了 1993 至 1994 學年度，全省學校總數增至 6,939 所學校。¹⁹戰後台灣教育部門的擴張，使教育機會日趨平等，而且愈年輕者愈有受教育的機會。²⁰因此，教育不僅影響了社會階層的變化，而且也影響了人民各種態度與行為的改變，例如對家庭的態度、兒童養育方式、政治參與的方式、個人的現代化程度、個人的宗教觀……等，都受到教育的影響。²¹總而言之，戰後台灣

¹⁸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O.C.,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6), p.11.

¹⁹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台北：教育部，1994)，頁VII。

²⁰ 王德睦等：〈教育結構與教育機會均等〉，收入：瞿海源、章英章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86)，頁353-377。

²¹ Hei-yuan Ch'ü,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in H. H. Hsiao et. al.

的社會變遷與經濟發展，在很大的幅度內受惠於教育的擴張。

但是，戰後台灣的教育卻也問題重重。以高等教育而言，戰後台灣的大學與研究所教育發展最快，但距舊《大學法》所謂「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的目標尚遠，大學教育尚難提昇至世界水準。除物質條件限制外，現行招生方式、師資素質、研究風氣以及政策上的「齊頭主義」，而不鼓勵突出或爭取學術獨立，都是阻滯大學教育不能發展的因素。²²其實，除了上述技術性問題之外，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的根本問題在於：**教育主體性的失落**。也就是說，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作為促進經濟發展或整軍經武的工具，「教育」部門是為了經濟部門與政治部門而存在。光復後幾十年來，台灣的教育部門中的重要政策決定，如教育資源的分配、教育機會的分配、教育內容的擬定等，常常受到教育部門以外力量（如國防或經建部門）的干擾或調整。一位參與經建工作的高層技術官僚就提出這樣一段歷史的證言：²³

四十年來，台灣所以能推動經濟發展成功，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育在不同的階段，都能配合資源的多寡，與產

eds.,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Taip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9), pp.187-205.

²² 張春興：〈民國三十九年以來學校教育的發展與檢討〉，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 387-429。

²³ 孫震：〈教育打破門戶之限〉，收入：天下編輯：《走過從前回到未來——攜手台灣四十年》（台北：天下雜誌社，1988），頁 47；更詳細的論證，參考：Sun Che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Postwar Taiwan", in Stevan Harrell and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91-110. 關於戰後台灣經驗中，政府在教育部門扮演重要角色，參考：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 1986), pp.112-3.

業發展步調一致。例如早期的台灣，資源有限，產業都屬勞力密集型，那時台灣的大學生很少，但小學、初中，和職業學校卻很發展，剛好和勞力密集工業配合上了。假定在當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花大筆錢辦高等教育，訓練出許多大學生也沒有用，因為工業尚在起步。

但是後來隨著產業技術水準的提升，台灣教育水準也跟著提升，現在國內已有許多大學生。這種將資源有效分配產業和教育，仗其相得益彰而不脫節，是相當難得的。

在政策的強勢主導之下，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是經濟與國防建設的基礎。各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執行國家政治及經濟政策的工具。各大學系所的增設、資源的分配，乃至教育內容的決定，莫不深深地受到政府意志的滲透。²⁴

(2) 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部門，為了有效地執行國家政策，所以必須配合經建或政治及軍事需要，發展策略性學門（如應用科技、國防科技、外貿學門……等），而且，為了確保國家意志的落實，大學共同必修科目的規定乃成爲必須。從戰後台灣史角度來看，共同必修科目有助於匯集有限資源，在某一特定目標（如凝塑政治共識或促進經濟發展）上力求突破，就其

²⁴ 但是，我必須再說明：政府在教育部門扮演重要角色，並不是戰後台灣的特殊現象。事實上，在戰後的日本亦有類似的狀況。最近的研究文獻更告訴我們：從十九世紀以降，英國、法國與美國的教育系統在形成過程中，都受到國家意志的影響。國家教育系統對於兒童的社會化、社會秩序的維持，乃至國家發展的推動，都發揮重要的作用。參考：Andy Green,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二十世紀美國的大學結構與教育目標，也深深地受到大財團與政府的影響。參考：Clyde W. Barrow, *Universities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Corporate Liber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894-1928*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完成國家教育政策這項目標而言，共同必修科目有其一定的貢獻。但是，國家的政治部門與經建部門從政治宣傳或經濟建設立場，卻也同時要求教育部門負擔極大政治教化與經濟起飛的責任。流弊所及，造成我們許多的青年追逐權力與金錢的扭曲人格，傳統中國文化中所謂的「民胞物與」的氣度，所謂「天人合一」的胸襟，早已成爲可遇不可求的奢侈品。孰爲爲之？孰令致之？過去的教育政策是要爲今日的病態負相當的責任。

光復後半世紀以來，台灣的高等教育由於教育主體性的失落，所以學術區隔化的問題遠較其他國家嚴重。二十世紀以降由於學術分工過細，導致「大學」(University)作爲知識統整場所的目的爲之失落，使許多有識之士爲之憂心不已。²⁵這個普遍性的問題在台灣地區各大學尤爲嚴重。最近十餘年，許多教育界人士提倡通識教育，就是針對這種由於「教育主體性」失落而導致的大學教育專業未必有餘，但宏觀顯然不足的弊病而發的，1983年8月，台大的「通才教育工作小組」在規劃報告書中就這樣說：²⁶

²⁵ 早在1949年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在1949年新制東大第一屆開學典禮時，就特別指出，近代各學科的發展引起了科學的分裂，使本來應當承擔知識的統一之重擔的大學爲之失落。他呼籲應從學問的整體立場來思考大學的責任。轉引自：山田昭次：〈歷史學と歴史教育〉，收入：歷史學研究會、日本史研究會編：《現代歷史學の展望（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1-1979），頁195。

²⁶ 台大推行通才教育工作小組：《開設十三門選修課程計劃報告》（1983年8月提出，未刊稿本），後收入：虞兆中：《台大與我》，引文見該書頁209。當時學界人士如葉啟政、黃堅厚、黃炳煌也一致主張通識教育以提供學生整合的知識與眼光爲目標，參考：林火旺：〈訪葉啟政教授談大學通才教育〉，《民生報》，1982年3月17日。黃堅厚先生在「社會文化與科技發展研討會」上，爲「教育與科技發展」組所作之結論，見《社會文化與科技發展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國科會，1983），頁601以及黃炳煌：〈科技發展與課程發展〉，《社

當前大學教育太早分科，學生缺乏本門以外的知識與方法，目光侷限一隅，不能把握歷來重要思潮的演進，亦無法全面觀照現代知識的發展。本計劃旨在針對此弊，於現行大學教育的架構中，作適度的補求。

「十三門選修課程」將配合「28-50-50」新學分制，使學生在自由選修時，可得到較佳的通才訓練。這十三門課程就是：

文學與藝術

歷史與比較文化

社會與哲學分析

數學與自然科學

應用科學

五大類，依實際需要作適當分配而設。用意並不在於灌輸各學科龐雜瑣碎的知識，而在於讓學生通過這些課程了解：自身與自身（生理或心理的）、自身與社會環境、自身與自然世界，相互間種種關聯，使學生生活於現代社會而知如何以自處。同時強調人類取得這些知識的方法，讓學生日後對其他學科知道如何入門，知道如何在本門工作上借助其他學科的方法，甚至知道如何批判各門知識適用範圍的局限，以利於科際整合。

這種看法在國內學界頗有代表性，教育部在民國 73 年（1984 年）4 月 5 日，以教育部台（73）高字第 11986 號函通令

全國各大學實施通識教育，在附件〈實施要點〉中所呈現的看法就完全與當時台大工作小組的意見若合符節，互相呼應，蔚為當時通識教育改革的主流意見。

(3) 上述通識教育改革的呼聲，隨著 1987 年 7 月戒嚴令廢除，台灣快速邁向自由化與民主化之後，而更加壯大。通識教育改革的潮流之所以能由涓滴匯為巨流，主要原因乃是由於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之後，大學角色從過去之作為國家意志的實踐場所，逐漸轉化為社會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已不再完全是國家政策的執行工具，為統治者培養馴服的「臣民」；它已逐漸轉變為社會意見的反映場所，它為社會培養有自主意識的「公民」。近年來台灣地區的大學之角色的轉變，從各大學校長由學校自行組織委員會遴選產生這項事實，最可以反映大勢之所趨，誠所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矣！這種變遷也反映在民國 82（1993）年 12 月 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新《大學法》第一條：「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的條文之中。

（二）通識教育的涵義：建立人的主體性的教育

(4) 在這樣的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時刻裡，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最具關鍵性也最具重要性。那麼，什麼是「通識教育」呢？

所謂「通識教育」可以區分為兩個層次：(一) 核心課程；(二) 一般課程，但是不論是前者或後者，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建立人的主體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並與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性之關係**」這項教育目標有關。我們可以說，所謂「通識教育」就是一種建立人的主體性並與客體情境建立互為主體性關係的教育，也就是一種完成「人之覺醒」的教育。以上這一個定義中的「主體性」一詞，可以從兩

個方面釐清其實質的意義：

(4:a) 第一，所謂「主體性」是指「主-客」對待意義下的「主體性」，其具體涵義在於：受教育者是一個「主體」，相對於受教育者以外的客觀情境（諸如文化世界、社會、政治、環境或自然世界）等「客體」而言，不論就發生程序或就重要性而言，「主體」均優先於「客體」，只有受教育者才具有優位性。所謂「通識教育」就是一種促進人的主體意識覺醒的教育，使人可以挺立心志，自作主宰，而不再屈從於人以外的「客體」的宰制。

在這個「主-客」對待意義下，作為促進人的主體意識之覺醒的通識教育，正是中國傳統儒家教育的理念。在先秦儒家中，孔子（551-481B.C.）僅揭示教育之目的在於培養整全的人格，但這項教育理想的細部問題到了孟子（371?-289?B.C.）及荀子（298-238B.C.）手中才獲得較為充分的論述。孟子對於「教育的目的在於喚醒受教育者的主體性」這項主張論述最多。他兩度（《孟子·萬章上·7》及《萬章下·1》）引用伊尹「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的話，闡釋「教育」就是一種「喚醒」主體性的過程。相對於與「主體」相對應的客觀環境而言，孟子雖然強調時空條件如富歲、凶歲、肥地、磽地、居室……等客觀環境，對於人的心性修養會造成影響，如〈告子上·7〉、〈告子上·8〉、〈盡心上〉等都有類似看法，但是，孟子在談到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時，所重視的是以人的主觀修養的功夫成就，來轉化或超越客觀環境的局限性。將這個立場闡釋得最清楚的就是《孟子·公孫丑上·2》所謂「知言養氣章」這一章。孟子重視人的養氣工夫，他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之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孟子·公孫丑上·2》），經過養氣工夫的轉化之後，這種原來是自然世界的氣，可以轉變為文化世界的「浩然之氣」，並反過來充塞於自然世界的天地之間，甚至於也可以改變自然所賦予人的形貌，孟子稱

之為「踐形」(《孟子·盡心上》),而在有形與無形之間建立起連續性。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孟子所走的基本上是「以主攝客」,而不是「以客攝主」的路線。孟子強調人要盡其在我,興起心志,以轉化客觀世界為其職志。孟子這種「以主攝客」的路線,不僅強調「主體」先於「客體」,使之合而為一,也主張人的「心」可以支配並轉化人的「身」,以達到心身一如的境界。相對於教育所能發揮的政治教化作用而言,孟子雖然也指出教育可以使「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上·3〉),可以使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得其宜(〈滕文公上·4〉),也可以得民心(〈盡心上·14〉)。但是,我們只要再進一步分析就可以發現:孟子談論這些政治教化的效果,只是視之為教育的延伸效果,而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標。換言之,教育的目的在於促成人的主體性的覺醒,而不是在為政治服務。孟子將教育之作為喚醒主體性的過程這一層涵義作了最深刻的發揮。²⁷

先秦儒家以喚醒人的主體性為目標的人文通識教育理念,一方面迥異於法家將「人」化約為政治工具,將教育內容化約為富國強兵的學問;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漢代儒生之以學校作為訓練統治人才的機構,以教師為訓練師,先秦儒家的教育理念確有其歷久彌新之內涵。儒家這種教育理念,在南宋大儒朱子手中獲得最充分的發揮。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指出,朱子的教育以「為己之學」為目標。這個目標與朱子的人性觀以及朱子對「自我」的新概念結合在一起,強調人在道德上的「自任」與精神上的「自得」。這是典型的新儒家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通貫於宋明清儒家著作中以及所謂「豪傑之士」、「大人」或「大丈夫」等說法之中。所謂「為己之學」這句話,意指教育不應當僅為政治或社會目標服務,教育必須以實踐每個個人完全的人性潛力為目標。從這個觀點而言,每件事都有賴

²⁷ 參考本書第三章第三、四節。

於個人人性觀念的充實，有賴於對人的不同需要與能力的各個層面加以關切，追求對人的「自我」作更深入的理解。他以人性的「全體大用」這個名詞來加以綜括。朱子努力地想從哲學上來詮釋這個概念，使它能引出一個定義明晰的教育程序。²⁸

最近幾年來，臺灣的各大學陸續展開的通識教育教育課程規劃工作中，有些學校頗能扣緊我們在這裡所說的以「促進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為目標的通識教育意義。1994年9月，台大通識教育小組印發給學生的《國立台灣大學通識教育實施手冊》就很能掌握這種「主—客」對待下的通識教育意義，《手冊》說：²⁹

大學教育的定位正隨著時代在演變。大學不再像過去只做職業人才或專業人才的訓練。逐漸步入現代社會的同時，大學亦應著重培育現代社會的知識男女，使他們能在當代最佳的知識基礎上，發展出獨立思辯與分析判斷的能力；使他們面對知識時，能具有充份自覺的主體意識，以溶入人類文明創造活動；並協同其他人建立起未來社會的新價值與新秩序。事實上，這個重擔到二十世

²⁸ 參考：Wm. Theodore de Bary,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Hongkong and New Y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譯本見：李弘祺等譯：《中國的自由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狄百瑞著，黃俊傑譯：〈新儒家教育與儒學洗禮後的東亞〉，《史學評論》第9期（1985年1月），頁33-42。張永俊：《傳統中國教育與現代通識教育之研究（7）：朱子的教育觀及其對現代通識教育之意義》，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報告，NSC82-0111-S-002-017，1994年6月20日；何寄澎：《宋代書院教育及其啟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報告，NSC82-0111-S-002-018，1994年3月31日。

²⁹ 〈與大一同學談通識教育——本校通識教育工作小組的信函〉，《國立台灣大學通識教育實施手冊》（民國83年度）（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1994），頁1。

紀中葉以後，已變成大學教育不能逃避的責任。

所謂培養人的「充份自覺的主體意識」，正是我在此所說的第一個層次的通識教育的重要內涵。

(4:b) 我所說的第二層次的通識教育定義中的所謂「主體性」是指「主一副」對待意義下的「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下的「主體」是指受教育者，而「客體」則是指教育的實際效益，諸如富國強兵、經濟發展或高科技發展等。相對於教育所能創造的實際效益及其延伸效果而言，受教育者的人格的建立與道德福祉的提昇，更具有本質性的地位，因而也有絕對優位性。

這個意義下的通識教育對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而言，特別具有啓示。正如我在上文所說，光復初期台灣的教育以培育反共抗俄人才為目標，各級教育頗受政治之主宰；民國五〇年代以後，教育則又為經濟建設而存在；六〇年代則又以科技發展為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標，五十年來的教育部門多半是為非教育部門（如政治、經濟或科技發展）而存在。過去五十年來，國內教育政策受到「人力規劃」概念的桎梏深且鉅。曾參與光復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的高層領導人士，曾說明教育對經濟的作用：³⁰

無論從事政治上的改革或經濟上的發展，其國民先須具備某種程度的教育水準；而且，這種教育水準要不斷地提高，才能提供由封建而民主的社會，以及由農業轉變為加工性工業、再由加工性工業轉變為創新性工業所需要的高素質人力。我們一直認為開發人力資源及投資教

³⁰ 李國鼎、陳木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下冊，頁 483。

育是良好的長期投資，台灣的教育不僅相當普及，而且其水準不斷提高，近十年更加強專業性教育的推展，以應技術密集工業發展的需要。

這種說法固然是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實情，但是這種只重視教育的附加價值而忽略教育在喚醒人之主體性的根本內涵，是不足以肆應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的需要的。我們所提倡的通識教育改革正是針對這種功利的教育觀而力求改善。

以上不論是從「主客對待」或從「主副對待」而言，只有受教育者才是教育活動的主體。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說，「通識教育」就是一種朝向完整人格的建立，促成人的自我解放的教育。

釐清了「通識教育」的定義之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發現：現階段國內若干大學所開授某些所謂「通識課程」，如「寵物保健」、「寶石鑑定」、「證券入門」及「汽車修護」之類，實在與通識教育的目標相去甚遠，因而雖可作為一般性之選修課程，但卻不適合列為通識教育課程。

四、兩種質疑通識教育的意見及其批判

（一）兩種質疑意見

本節第二小節所提出的「通識教育」的定義——「通識教育」是一種以喚醒人的主體性為目標的教育，在現階段的台灣環境中必然遭遇兩種質疑意見：

（1）第一種質疑是從國家發展的立場提出的，認為：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前夕的台灣所面臨的諸般挑戰之中，以產業及科

技升級最為嚴酷。台灣經濟在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中已相對落後，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困境之中與時間的強大壓力之下，台灣必須慎選若干策略性產業全力發展，並努力將台灣建設為一個「亞太營運中心」與「高科技之島」，才能在二十一世紀新世界秩序中站穩腳跟，而這一些建設都必須「產、官、學」三方面密切合作始克竟其功。在這種時間壓力之下，台灣教育的內容必須全力配合國家需要加以調整，所以，教育部門應提供產業升級及自動化、建立亞太營運中心、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服務業所需的人力，並推廣成人進修教育以及實施第一專長之補充訓練。³¹因此，這些人士認為現階段台灣奢言通識教育，未免不切實際而且昧於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大勢。以上這種對通識教育的質疑，可以稱之為「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質疑。

（2）第二種質疑是從受教育者的立場提出的，認為：二十一世紀基本上是一個「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服務業（所謂「第三級產業」）的重要性將超過第一級與第二級產業。³²在二十一世紀的「後工業社會」中，社會分工必然更趨細緻而嚴密。為適存於這樣的社會之中，二十一世紀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必須比二十世紀的人更具有專業知識，也必須如此才能更穩固地建立自己的專業尊嚴——因為二十一世紀個人人性的尊嚴是建立自己專業的職業尊嚴之上的。在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的前夕，提倡通識教育不僅容易陷入「時代錯誤的謬誤」（the anachronistic fallacy），而且可能將受教育者轉化為無一技

³¹ 這是教育部在第7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所提出的背景資料中，經建會所提出的看法，參看：教育部：《台灣地區教育發展簡報——當前教育主要問題檢視》（台北：教育部，1994年6月22日），頁35。

³²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之長，以致再度陷入前近代社會中「學而優則仕」的窠臼，成爲向掌權者仰望的向日葵。這種質疑意見，我們可以稱之爲「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質疑。

(3) 以上這兩種分別建立在「實用主義」與「專業主義」之上的質疑，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也在相當大的程度內可以契合台灣的現實需要。再從深一層來看，「實用主義」教育觀與「專業主義」教育觀也有其交光互影之處，這就是：兩者都認爲教育部門是爲了促成其他部門（如國家之產業升級或受教育者之獲得專門職業）的發展而存在。

(二) 質疑的批判

(1) 以上這兩種共同的心態正是戰後 50 年來台灣教育根本病灶之所在。正如我在本節第一小節所指陳的，台灣高等教育的基本病灶至少有二：一、是「**教育政治化**」，二、「**教育商品化**」。所謂「教育政治化」，是指四十多年來政府教育政策，直接、間接爲政治而服務，於是「政治領域」完全支配「教育領域」，使教育部門的自主性爲之淪喪。所謂「教育商品化」，是指從投資報酬的觀點看待教育問題，完全以「人力規劃」觀點，制定教育政策，使「教育領域」爲「經濟領域」而服務，提供各級經濟建設人才。這兩種弊病交互作用，其影響所及，使我國教育成爲政治或經濟的工具。數千年來，中國儒家所提倡的所謂「爲己之學」的教育傳統，在戰後台灣爲之徹底淪喪。

在以上的背景之下，我們今日提倡通識教育，就具有深刻的意義。就高等教育本身而言，通識教育是一種促進人之覺醒或人之自我解放的教育，使受教育者興起心志，自作主宰，成爲頂天立地的人，這也就是古典儒家所謂的「君子」的人格典範的建立。其次，就高等教育與其他政治經濟部門的互動而言，通識教育的提倡與落實，可以針對過去「教育政治化」與「教

育商品化」的問題而有所矯治，重建教育部門之作爲喚醒人之覺醒的領域之自主性與主體性。這一點對於快速邁向民主化的台灣，實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義。只有在重建教育部門的自主性這個脈絡中，我們所推動的通識教育，才取得本質上的意義。總而言之，正如朱敬一所說的，「教育事業不是下游產業」！³³

(2) 再就這兩種質疑的具體論據來分析：第一種「實用主義」的質疑，基本上是戰後東亞四小龍（尤其是台灣）所感受的時間壓力感，在教育政策上的反映。從戰後「台灣經驗」史的回顧來看，我可以同意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的觀察，他說：³⁴

東亞人民逐漸感受政治和經濟急迫感，有助於動員地方支持工業發展。日本和四小龍一直都處在軍事威脅下，他們記取二次大戰的教訓，了解美國的成功在於優越的經濟基礎。六十年代，有鑒於美國將結束對東亞的軍事經濟援助，這些國家的領袖都認為，為了要自衛，他們必須打下強大的工業基礎來購買、或最好自己製造所需的設備。

這五個國家的急迫感也來自經濟事實的體認。由於二次大戰以後人口增加，而地理面積和資源有限，在食物和原料方面無法自給自足，必須外銷產品賺取外匯，向外購買賴以生存的食物和原料。這種恐懼營造了一種氣氛，使許多領袖在這種氣氛下願意彼此合作，解決他們

³³ 朱敬一：〈教育事業不是「下游產業」〉，《中國時報》（1995年10月15日），收入：《澄社報導》28期（1994年10月），頁58-60。

³⁴ Ezra F. Vogel,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賈士薈譯：《躍升中的四小龍》（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2），頁122。

內部的歧見。恐懼也使一般民眾願意忍受權威性的政治管理，以及犧牲短期的經濟需求。

所謂「政治和經濟急迫感」，是形成戰後 50 年來台灣教育政策的重要因素，在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確有其貢獻。1949 年大陸巨變政府遷台以後，台灣在內憂外患的危局之下，教育部門面對沈重的「時間壓力感」，要在最短時間之內，將教育的實用功能發揮到極限，以便配合國策，完成使命。以所謂「人力規劃」觀點來制定教育政策，就是在這種「時間的壓力感」之下，不得已的必然的抉擇。

但是，這種「急迫感」與「時間的壓力感」，卻也伏下了今日台灣的亂源。讓我們且聽一位經建領導人的自我反省：³⁵

過去政府為了急於要提高國民所得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謀求國家的富強，將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而未能以同樣的注意和力量來從事文化建設，結果我們物質方面的確進步了，可是精神方面卻相形落後。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脫節，可以說是造成當前社會上許多病態和問題的主因。我們不能否認當前社會紀律巨幅轉變，大家有錢的結果變成金錢萬能，一切以利為出發點。笑貧不笑娼已成為現今社會的價值觀。

爲了矯治這種隨著「急迫感」而來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觀所帶來的問題，通識教育正是一帖苦口良藥。

第二種「專業主義」的質疑，則忽略了大學部教育與研究

³⁵ 孫運璿先生之言，見前引《走過從前回到未來》，頁 99。

院教育的差異。在過去高等教育不甚發達的時代，大學部教育已經是菁英教育，所以所注重的是專業知識的傳授與能力的培訓，這種教育目標很具體地呈現在民國 37（1948）年 1 月 12 日國民政府所制定的《大學法》第 1 條條文之中：「大學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舊《大學法》所強調的是「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業主義的取向十分明顯。但是隨著教育部門的快速擴張，新大學的增設，大學就學學生數佔人口的比例日益增加，根據教育部 1994 年的統計，全國總人口每千人中大學院校學生數是 15.33。³⁶在這種狀況之下，大學已經愈來愈成為培養學生基本（而不是高深）學識的場所，新《大學法》第 1 條條文：「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就充分表現這種轉變，因此，通識教育在大學部教育中所佔的份量日趨重要乃是不爭之事實。至於學生的專業訓練，在大學部教育快速擴張與普及的前提之下，應在研究院階段完成。

但是，我們以上對兩項質疑所提出反駁，基本上是從回顧過去 50 年台灣教育的角度提出的，與這兩種質疑都從對二十一世紀的前瞻著眼並不完全契合，可能並不是充分的反駁，因此，我們必須再進而從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展望這個視野，批判以上兩種對通識教育的質疑意見。

五、結語：通識教育與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展望

³⁶ 教育部：《台灣地區教育發展簡報》，頁 5。

從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新展望這個角度著眼，通識教育實在是台灣高等教育的重要工作，我的主要理由有二：(1)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社會新形態將使個人主體性日益彰顯，以「喚醒人之主體性」為目的的通識教育適合新社會的需要；(2)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新文化將以「自我意識的覺醒」為其主調，文化中的不同「領域」或「社群」之衝突是未來重大的文化問題，通識教育對於因應這個問題有其正面之作用。我們依序申論以上兩個論點。

(一) 通識教育與未來台灣社會

(1) 二十一世紀社會的若干特徵業已逐漸在台灣浮顯而出，1986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曾以具體數據，展望公元 2000 年台灣的經濟發展前景，其中尤其以以下幾項趨勢特別值得重視：

1、從生產面來看，在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中，服務業所佔的百分比日趨重要，在 1985 年佔 44.3%，低於工業的 49.7%，但是到公元 2000 年，則將高達 50.0%。在這個服務業高度發展的大趨勢之下，各部門的就業人口也發生結構性的變化，經建會的預估資料顯示：農業部門佔 17.5%；工業部門 41.4%；服務業佔 41.4%。但是到了 2000 年，行政院經建會的預估則是：農業部門所佔就業人口百分比下降到 9.1%；工業部門為 39.4%；而服務業則高佔 51.5%。在這種發展趨勢中，每 1000 人中，曾受過職業訓練的人數，也將從 1985 年的 102 人，到公元 2000 年提昇為 165 人。

2、從人口的住居地點及生活狀況來看，都市人口佔台灣總人口的百分比從 1985 年的 73.0%，到公元 2000 年提高為 87.0%。隨著都市化程度的加深，台灣的人口中自來水使用率，也將從 1985 年的 77.9%，到公元 2000 年提昇為 86.5%。每個家

庭每個月所使用的電力也將從 1985 年的 47.0 千瓦小時，到公元 2000 年提昇為 99.3 千瓦小時。

3、教育水準的提昇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台灣地區六歲及六歲以上不識字的人佔總人口的百分比：1985 年佔 8.4%，到了公元 2000 年將大幅降低為 4.7%。全台灣 15 歲以上的人口，受到高職或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也將從 1985 年的 38.5%，到公元 2000 年提高為 55.3%。

從以上三個經建會所預估的發展趨勢看來，貝爾（Daniel Bell）所謂的「後工業社會」的若干特徵已經開始在台灣形成並快速發展中，政府近年所推動的若干措施，如「資訊高速公路」、「高速鐵路」以及教育改革等，都有助於以上社會特質的加速發展。

在二十一世紀這種新形態的台灣社會之中，個人作為一個主體將高度覺醒。楊國樞最近比較及綜合了數十項有關二十一世紀研究的發現以後，列舉出二十項特點，作為現代人的主要心理與行為特質：³⁷

- 1.個人功效（personal efficacy）的意識（反宿命主義）
- 2.親戚關係的疏淡
- 3.平權的（egalitarian）態度與行為
- 4.對創新與變遷的開放或接受態度
- 5.兩性平等的信念
- 6.追求成就的動機

³⁷ 《教改通訊》第 2 期（1994 年 11 月 30 日），頁 11。

- 7.個人主義的取向
- 8.獨立或靠自己的精神
- 9.主動性的參與
- 10.對異己的容忍與尊敬
- 11.認知與行為的彈性或伸縮性
- 12.重視未來的取向
- 13.心理的分殊化（Psyc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 14.同理心的能力（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能力）
- 15.對資訊與知識的需要
- 16.生活中的冒險精神
- 17.超越關心當地事務的侷限（非地域主義）
- 18.世俗化的宗教信仰
- 19.對都市化生活的偏好
- 20.教育與職業的抱負

以上這些二十一世紀人格特質，雖未必一一出現於台灣，但是就其大趨勢來看，「個人主體性」的覺醒，當是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的基本特徵。在這樣的新社會中，人與人相處之道就比過去更形重要。誠如貝爾所說，進入「後工業社會」以後，「機械工業」就逐漸被「知識工業」所取代。³⁸人類所面對的已不是「人與機械」的關係，而是「人與人」的關係的問題，因此，如何合作協調就成為二十一世紀社會中人類最重要的能力。只

³⁸ 同註 30。

有通識教育才是培養這種整合其通觀全局的能力的重要途徑。

（二）通識教育與未來台灣文化

（2）再從二十一世紀台灣新文化的動向及其問題來看，通識教育也發揮極大的作用。我最近曾說明：³⁹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前夕的台灣，新的文化正在形成之中。這種新文化是以「自我意識」的覺醒為其基本特質，充滿了多元性，它與傳統中國政治主體主宰一切領域，「一元論」色彩很強的文化體系，有其本質上的差異性。從歷史角度來看，近百年來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存有歷史的斷裂，尤其是二次大戰以後五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台灣新文化得以孕育發展的重要歷史背景。但是，台灣新文化卻也面臨許多問題，其中較為重大者有二：（1）由於台灣文化中的各個「領域」或「社群」的「自我意識」高度覺醒，並從過去的靜止狀態走向活動之狀態，所以諸多「領域」或「社群」間之相互競爭乃至衝突不僅不可避免，甚至日趨激烈。因此，如何引導台灣新文化中各「領域」或「社群」回歸和諧之狀態？（2）台灣新文化既係以「自我意識」的覺醒為基礎，那麼，在台灣的「自我」展開的過程中，如何避免由於過度膨脹「自我」而落入狹隘主義（parochialism）甚至部落主義（tribalism）的陷阱？

面對這兩個文化問題，我們必須在教育中注入一種有機論（organicism）的觀點，使台灣的居民深深體認文化中的諸多「領域」或「社群」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而不是機械的關係，兩者間是一種持續的而不是斷裂的關係。只有基於這種認識，二十一

³⁹ 黃俊傑：〈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新文化：內涵、問題與前瞻〉，《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1994年12月10-11日，台北市，收入：黃俊傑：《戰後台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書局，1995）。

世紀台灣新文化才不至於因為「自我意識」的覺醒而陷入諸多主體互相衝突，或墮入部落主義之困局。而這有機論的眼光之拓展，則有賴於通識（而不是專業）教育來完成。

總結這一節的討論，我們可以說不論是從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社會、經濟或文化可能的格局來看，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均不容我們忽略。